

明清之际皈依天主教士人研究新论

□ 陈占山

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存在着一个由奉教士人组成的群体，其大体形成于利玛窦进京后的20年间。此后中国社会剧烈变化，该群体积极应对，竟得以顽强延续和发展。康熙晚年开始禁教，雍、乾两朝变本加厉。在这种背景下，奉教士人群体方大幅度萎缩。在本领域的研究中，奉教士人身份认定是一个难点。就目前而论，其确认的标准明显存在着可议之处。

关键词 奉教士人群体 形成 演变 身份认定

作者 陈占山，汕头大学副研究员、博士。（广东汕头：515063）

明清之际，随着天主教在华的广泛传播渗透，当时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奉教士人所组成的群体。该群体晚明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教中“三大柱石”为核心，清初则以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先后主持下的钦天监为凝聚点。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至今学术界似还没有明确提出。本文将对该群体的生成、演变进行初步论述，同时对有关讨论中教徒身份的判定标准予以辨析。

明清之际奉教士人群体的生成

中国士人皈依天主教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耶稣会士进入大陆的初期。1584年11月在肇庆住院，有位福建秀才接受领洗，教名保禄，他曾担任传教士的中文老师，并协助罗明坚用汉语编写《天主圣教实录》^[1]，这位不知姓名的文人或许是中国第一位奉教士人。不过，其人的从教并没有立即带动中国士人皈依的浪潮。晚明士人领洗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1601年利玛窦进京之后的20年间。李应试、徐光启、瞿汝夔、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孙元化等名士都是在这期间皈依天主教的。

笔者认为，上述人士的皈依标志着奉教士人群体已初步形成。这是因为：其一，核心成员全部到位。这是就“三大

柱石”而言的。由于他们是进士，当时或后来不久是名宦，因此他们的皈依之举对与他们有着同样精神欲求的士人来说，具有导夫先路的垂范作用；皈依后他们又都以圣洁虔敬著称。这些情形使其不仅成为当时奉教士人的楷模，且也是整个晚明奉教士人的精神领袖。其二，奉教群体已有相当规模。如1605年5月利氏在致高斯塔神父的信中声称：北京住院，“虽然历史最短，归化教友仅百余位，但都是好教友”^[2]。1608年利氏在给上峰的信中写道：“目前教友在四个省份内计有两千多人，北京教会有三百余位，多为知识分子。”^[3]其三，有共同的志向。奉教士人厌恶明中叶以来士人的空谈心性、“土苴实学”，而热衷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渴求对之加以翻译、介绍和应用，近则以解决国家的内忧外患，远则“超胜”、“会通”西洋。可举一显例：《四库全书》著录存目西学著作30多部200余卷，可以说是当时所翻译数百种著作中最重要的，而它们基本上都是在奉教士人参与下完成的。^[4]其四，教徒之间拥有紧密网络。中国传统社会成员常常以同僚缘、同年缘、血亲缘、师生缘等结成紧密的社会关系，天主教传入后，奉教士人之间自然也会借助利用、乃至发展这类关系。前述奉教名士中，除瞿汝夔外都是同僚；徐光启与孙元化及山西绛州的名士韩云、韩霖，李之藻与张焘、孙学诗等，杨廷筠与漳州名士张麇等均有师生缘；而徐

1995(6): 2

[29] 刘泽华.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337

[30] 张立文主编, 儒学精华(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6: 5-6

[31]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4: 83

[32] 陈永森. 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 江西社会科学, 2001(2): 37

[33]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85

编辑 一凡

光启与徐思诚（父）、徐骥（子）、尔觉、尔斗（孙）、陈于阶（外甥）等，瞿汝夔与式穀等皆有血亲关系。此种关系网的存在，使得当时及整个明清之际奉教士人群体更加稳固。

奉教士人群体的发展演变

万历四十四年（1616）教案、耶稣会内部的纷争及耶稣会士与30年代进入福建的方济各会士、道明我会士之间爆发的中国“礼仪之争”，都确实影响了中国士人的皈依进程。但如何估量其影响程度，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学者认为，“事实上1620年之后，耶稣会士们不再于大文豪和高级官吏中进行归化活动了。他们后来为之举行洗礼的任何人都没有像徐光启或李之藻那样的名望和权威，甚至也没有像王徵和孙元化那样略为逊色一些的人物。知识阶层全部变成仇视传教士及其教理的人士了。”^[5] 这样的说法虽不能讲一点根据都没有，但的确存在着较大的高榷余地：如所谓“不再”，就不知从何说起；而“知识阶层全部变成仇视传教士及其教理的人士了”，则更与历史的真实有较大的出入。由于耶稣会士的辛勤工作，徐、李、杨教中“三大柱石”的热情助化，进入天启一直到明亡，士人皈依的进程并没有停顿。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说：“据当时西士所记载，崇祯末年，教传十三省，教友约十五、六万，内有大官十四员，进士十名，举人十一名，秀才生监以数百计。”^[6] 上说还可求证于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从费氏书中所列毕方济、高一志和艾儒略3人的《传》来看，大体可以印证萧氏的说法。如在山西传教的高一志一人的工作成绩仅绛州一地是“至一志歿时，有教徒八千，中有二百人乃为有功名之夫也”。^[7]

当然，完全有这样的可能：萧氏书中所列举的数据本身就是源于费赖之这样的“西士”的记载。但在有关汉籍文献中，晚明士人皈依的相关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教会文献的说法。叶向高说：“其言天主，则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以故奉其教者颇多。”^[8] 崇祯十年（1637）《福建巡海道告示》称：“然其（传教士）巧词深辩，足新好奇听闻……于是穷乡僻壤，建祠设馆，青衿儒士，投诚礼拜，坚信其是而不可移易。”^[9] 同一文件还列举了本年度福安县抓获的郭邦雍等十四位奉教生员的姓名。又，崇祯六年，艾儒略前往漳州传教，反响强烈：“钝汉逐队皈依。深可痛惜，更有聪明者，素称人杰，乃深感其说，坚为护卫，煽动风土，更为大患。”^[10] 名僧株宏于崇祯八年撰文也称：“贤士良友多信奉故也……”^[11]；又说“现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时，众所仰瞻以为向背者……”^[12]；“奈何人教者，俱是名公巨卿。”^[13] 由此，士人踊跃皈依的情形应可从信。

那么，此时期都有哪些较为著名的教徒呢？除了“三大柱石”在此一时期的前期健在并在教徒中仍起凝聚作用外，如山西的韩霖兄弟、段衮兄弟，福建福清的李九标、李九功

兄弟，泉州张庚、张识父子，漳州的严赞化，建宁的李嗣玄等都是当时的名士。而他们的皈依，多与“三大柱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特别是福建皈依士人，多是艾儒略归化的。但后者由叶向高邀请入闽时，携带的杨廷筠宗教撰述就有多种，可见其对士人影响之大。据排教人士林启陆称：“崇祯八年，利妖之遗毒艾儒略辈入丹霞，送余有《天主实义》、《圣水纪言》、《辨学遗牍》、《骋鸾不并鸣说》、《代疑续编》诸妖书等。”^[14]

入清以后，由于仍有观象修历和铸造火器的需要，当然更出于笼络控制其人及教徒的考虑，顺治、康熙两帝对传教士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这使得天主教在清初的传播更为迅猛，而因任命汤若望、南怀人等教士长期主持钦天监事务，终促使此一官方天文机构同时兼有了天主教中国传教中心的职能，所谓“天学之在京师，为四方之望”。^[15] 据方豪先生统计，全国耶稣会教友，在崇祯九年时共38000人，顺治七年时约150000人，康熙三年时达248000余人。而据汤开建先生考证，顺治末年全国天主教教友255180人。^[16]

可是，由于清初中国教会不仅延续了晚明已开始的礼仪之争，且因欧洲传教士派出机构的直接插手，不但使争执在中国耶稣会和其它各修会之间激烈展开，还演化为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的正面交锋。这些争执除了带有主权、政治利益争夺的色彩外，在宗教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要不要继续坚持“利玛窦规矩”——即适应中国国情民俗的传教策略，对于包括士人在内的中国教徒而言，就是他们能不能继续参加传统社会赋予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祀祖祭孔。上述争执使天主教文化专制的本来面目及与中国儒家文化本质的不同，最大限度地得以暴露。由此，皈依知识界人士或政府官员等高层次人才，虽为传教各方所关注，但并无多大进展。1703年，魏方济神父就中国教务现状给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中特意指出：虽也有秀才、进士，甚至一些政府的官员皈依了天主，但“人数不多，且集中在北京钦天监里”^[17]。晚明以来中国教徒平民化的趋向，在清初更为明显。

由于钦天监在清初教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遂成为反教人士杨光先伺机打击的目标。康熙三年杨氏掀起历狱，以“荣亲王葬期有误”，唆使官方在第二年一次就杀害了以李祖白为首的5位奉教监官；八年，受康熙帝支持，南怀仁得以从杨光先手中重新夺回钦天监领导权，并再次把它经营成为中国天主教的一个中心，监官、特别是历科官员多皈依了天主教。康熙四十一年（1702）钦天监副鲍英齐等在京奉教士人联名撰写《上教皇书》，备陈他们对愈演愈烈的礼仪之争诸问题的看法。在联名的50位奉教士人中，监官即占了33位。^[18] 可见，这里已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奉教士人的心脏。

康熙晚年开始的禁教政策，到雍、乾两朝已十分严厉，入教儒生大为减少。在这种情形下，奉教士人群体大幅度萎缩。只是中国官方天文机构职事世守不替的传统以及任用西洋教士主持监务和负责主要天文工作，在雍、乾两朝乃至嘉

庆、道光的前期不曾改变，所以中国奉教监官的兄弟、子孙们很可能还维系着他们家族、家人原有的信仰。

除前奉教监官外，顺、康时期汉化程度很高的皇亲国戚佟国器兄弟，浙江士人朱宗元、张星曜，以及在康熙中后期礼仪之争最激烈的时候，踊跃为中国传统礼仪和耶稣会中国传教政策辩护的严谟、丘晟，特别是有着士人、教徒、教士三部曲经历的吴历、刘蕴德等人，都可谓此时奉教士人中深具影响的人物。其实，还有不少知名文人本是教徒，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为人知，如由陈垣、方豪、黄一农等先生挖掘出来的清简亲王德沛、著名画家吴攀及清顺、康间官至一品的大学士魏裔介等。^[19]

奉教士人身份的认定

这是奉教士人群体研究中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由于一些相当著名人物的教徒身份存在着争议，诸如冯应京、李天经、金声、瞿式耜、焦璉、丁魁楚等等，若要将他们纳入研究中，除非先确定其教徒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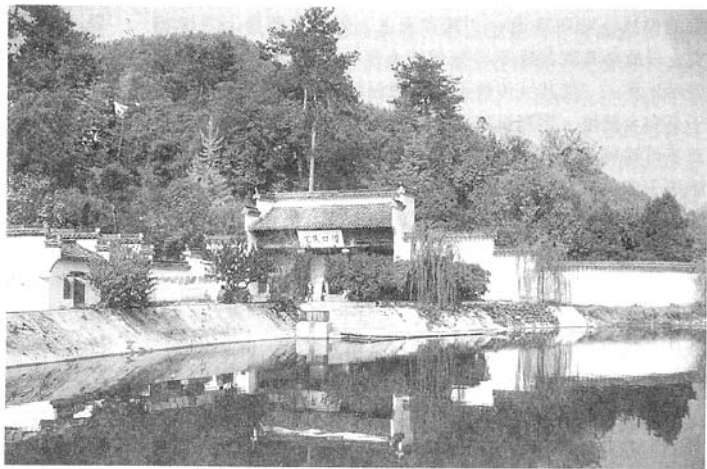
对于上述人物，除个别人外，之所以不能遽断其是否教徒，一般是由于教会文献言之凿凿，但缺少教会外汉籍之印证，甚至相反，在后一类文献中发现其人有妾，或与僧人往还、相信术数、供奉杂神等情，而引起学者质疑。可事实上，这方面的问题颇为复杂，以下试对研究中面临的困境略作剖析。

笔者认为，此时期中国士人皈依天主教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对天主教本身的接受。由于耶稣会传教士采取的是适应儒家的传教策略，大多数士人都不把天主教视为外学，而是作为秦汉以前中国就存在的“先儒”和“本儒”，由此他们把皈依天主，视为“重返本儒”，因而根本不存在一般宗教皈依中那种脱胎换骨式的心理变化。事实上，士人皈依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天主教戒律中的“不二色”。中国士人中极为普遍的“有妾”现象及能否休妾、或放弃纳妾，就成为能否皈依、或皈依后能否守戒的一个关键。对于这一点，入华初期的利玛窦及其同伴就有深切的观察和认识。如1592年的11月和12月，在韶州住院的利玛窦和石方西在他们分别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都谈到了这一问题。^[20]利氏声称除了在没有教徒的地方传教的一般困难外，“最大的障碍是中国行多妻制”。10多年后，利氏在给他父亲的信中，仍有相同的说法：中国人皈依天主“最大的阻碍是多妻制，有时因妾生育了子女，的确不易把他们拆散”^[21]。种种迹象表明，这一障碍在明清中国士人皈依天主教的历程中是贯穿始终的，人们都熟知瞿太素、李之藻、

杨廷筠等教中名士当初因此迟迟受洗的故事，而近有学者指出，冯应京最终没能受洗，恰恰也还是由于冯氏有妾。^[22]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上世纪90年代初黄一农教授发现清初礼部侍郎薛所蕴（？—1667）也“颇有入教之念，却因婚姻状况而难成夙愿”^[23]。确实，由于有这样的门槛，很多士人被挡在教会门外。

尽管上举事例可以充分说明，明清天主教传教士在对有妾士人的皈依问题上，严格坚持了教戒规定，但同时很可能有例外、或变通的方法：在前所引1592年石方西给阿桂委瓦的信中就提到：“假如某人有多妻，许下只和正妻有交往，妾虽生活在同一宅内，但和他们没有来往，就给这种男子付洗；假定对他们缺乏信心，尤其是新皈依的，而其似乎又欠恒心，就不给他们付洗。”由于文献缺载，我们还无法知道这样一条与前述原则比较起来已大打折扣的变通作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但有迹象表明，在一些皈依者身上的确实行过。如许大受曾抨击教士：“督其徒使出妾，而他高足之蓄妾者至数人。”^[24]问题是既存在着这样的变通，那么在现今讨论、辨认一些士人的教徒身份时，还能不能，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是否有妾作为判别的一个标准？事实上，不只是在入教时很可能有过通融，而受洗后不能坚持此教戒而蓄妾者，也大有人在。众所周知者如王徵，徐光启的外孙许缙曾等。综合上述两种情形，就不能不给现今这方面的研究带来困境，瞿式耜有妾，是不少学者否认其为教徒的一个原因^[25]。可是，究竟如何才能排除瞿氏就一定不属于上说的两种情况？

对士人教徒身份认定中，经常碰到的又一个问题是“与僧人往还”，或在其诗文中有“佛教的影子”。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也是排除其为教徒的一个标准。由于天主教信仰绝对排他，但碰上一贯具有兼容并蓄传统的中国士人，要坚持天主教的纯洁性亦非易事。利玛窦曾如是说：“教导中国人应



图为茶萃古徽州明清民宅的港口

唯先 摄

如何考察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演进

□ 高放

内容提要 北京大学张光明教授新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考察》一书，对许多人物的评价，对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社会主义观及其演进过程的认识都有自己新的思考和独特的分析研究方法。作者更是注重密切联系实际来说明问题，而且潜心于独立思考，敢于力排众议，发表自己的新见解。然而，作者的这些新见解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中，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和什么样的党领导的执政体制这一关键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观 从西方到东方的演进 党领导的执政体制

作者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07）

张光明新著的五个特点

披读北大教授张光明新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考察》，感到从内容到文字表述都较新鲜，不愧是潜心探索社会主义演进的一本新作。掩卷沉思，析出本书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全书分三篇，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着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六位的社会主义观，还简要论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各个人物都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特评价。本书虽然不像教科书那样全面系统，但是重点突出，兼顾全面，尤其是注重挖掘并展现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某些重要的、至今人们还

该把唯一的天主当作至高的神明来崇拜虽则是容易的；但同样困难的却是劝说他们把他们那根本不值一顾的偶像全部都从宝座上撤下去。他们不能使自己消除这种看法：偶像可以看作是真神的传道者，并且可以像尊崇基督教圣徒一样地加以礼敬。”^[26]

从文献记载来看，传教士要求皈依者信仰要绝对纯真，但正如前述“不二色”的教戒一样，从教后一些士人仍不能放弃“兼容”的嗜好。如杨廷筠皈依后，一日忽谓先生（指郭居静，金尼阁二位教士）曰：“天主之当奉，固矣，谓其为天地万物之主也；吾闻释氏乃西方圣人，即并奉之，亦何伤乎？”^[27]从前引利玛窦言，可知杨氏“并奉”的想法绝非其独有。皈依天主教后，继续与僧人往还，在奉教士人中有

重视不够的线索。例如，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演进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如何发生变革，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更新等。

第二，对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社会主义观，作者不是停留在人们已经熟知的水平上，而是认真垂读原典文本，探明其真实思想，考察其演进过程，尤其是对理论界有争议的问题，作出正本清源的阐释。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于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的回信中所谈到的俄国人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除了俄国的农村公社成为未来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直接过渡的有利条件之外，还必须以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胜利为前提；而近10多年来我国理论界有很多人却把“跨越卡夫丁峡谷”作为落后国家可能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

一定的普遍性，至于其它与教徒身份不相称之事一再出现与“僧家往还”一样，也是前述中国人“兼容”顽症的一种体现。1609年奉教已有4年之久的瞿汝夔，仍“极度地沉迷于炼金术中，甚至还竭力劝说里奇（利玛窦）跟他一起去学炼金术”^[28]。就连后来晋升为司铎的吴历，也不能例外，其虽自幼领洗，但“40岁前时与僧人往还，天主教事迹则不彰”^[29]。上述就又有与前述类似的问题：既然很多明确为教徒的士人都有“兼容”行为，那么，把这一因素作为排除、否认某些士人教徒身份的依据，理应也有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有三点：第一，明清之际的确存在过一个由奉教士人组成的群体；第二，天启年间以后一直到明亡，士人皈依的进程并没有停顿，甚至于在清初的相当

第三，作者不是单纯从思想理论本身的传播来考察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而是密切联系客观实际、尤其是经济实况的变化来说明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例如：从19世纪末以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持续地、猛烈地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潮，可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在西欧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却越来越得势，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衰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使得劳资关系大大改变了，从而使改良主义拥有了深厚的基础；而东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却又极想避免西欧资本主义经历的灾难、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所以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俄、中等国大受欢迎，越来越兴盛。这就为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历史唯物主义深度作了有力论证。

第四，作者在考察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潜心于独立思考，敢于力排众议，发表自己的新见解。例如，当今国内外一些流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有不同的评价。有的人固守苏联模式，批评改革是离经叛道；有的人在欢呼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同时，把马克思学说与先前的计划经济联在一起当作彻底失败的幻梦来嘲笑；有的人惊呼对外开放破坏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要以儒化来抵制西化。本书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长期演进的结果，认为作为落后国家的中国，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遵循历史规律，

使社会主义树立于生产力高度发达、民立制牢固确立、个人自由和自立意识有充分保障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地基，就不会有丰富完整的社会主义。

第五，作者在潜心研究中还十分注重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书中有不少问题都引述了别人的观点，并且表示赞同甚至赞赏。例如，书中认为到19世纪最后十年即第二国际早期，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工人运动公认的权威性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融为一体，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作者在注释中写明，“黄金时代”这个说法是采用波兰学者科拉科夫斯基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2卷的书名。此外，本书还有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都是作者精心搜集到的。

以上5点透露出作者的科学构思、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对如何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演进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启示。

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演进，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本书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很多新见解，但未必都是能够成立的，未必都是论证十分周密的。有不少热点、难点问题还有待商榷和探讨。这里仅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和什么样的党领导的执政体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质疑。

一段时间仍有很著名的文人教徒；第三，学术界关于奉教士人身份的认定标准明显存在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2][3][20][21] 罗渔译. 利玛窦书信集. 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1986: 467—469、289、384、126、507、282
- [4] 陈占山. 四库全书载录传教士撰译著作述论. 文献, 1998(1)
- [5] 谢和耐. 耿升译. 中国和基督教.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67
- [6]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河北省献县天主堂, 1931: 198
- [7]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耿升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92
- [8] 艾儒略. 谢方校释. 职方外纪.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3
- [9][10][11][12][13][14] 徐昌治. 圣朝破邪集. 日本安政乙卯冬翻刻影印本: 11199—11209、1231、11491、11493、11447、11444
- [15] 李祖白. 天学传概.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2册). 台湾学生书局, 1966
- [16] 方豪. 中西交通史. 汤开建. 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堂教友考略. 清史研究, 2002(3)
- [17] 杜赫德编. 郑德第等译. 耶稣会中国书信集. 大象出版

社, 2001: 235

- [18] 黄一农. 被忽视的声音——介绍中国天主教士对“礼仪之争”态度的文献. 台湾: 清华学报, 1995(2)
- [19] 陈垣学术论文集. 65—182;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221—226; 黄一农. 张宸生平及其与杨光先间的冲突. 九州学刊, 1993(1)
- [22] 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 调适与会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673
- [23] 张宸生平及其与杨光先间的冲突. 九州学刊, 1993(1)
- [24] 圣朝佐辟. 圣朝破邪集(卷4)
- [25] 黄一农. 扬教心态与天主教传华史研究——以南明重臣被错认为教徒为例. 清华学报. 民国83年9月新24卷第3期; 瞿果行. 瞿式耜“入教”和“借兵”考辨. 清史研究通讯, 1990(4)
- [26] 何高济等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53
- [27] 丁志麟. 杨洪园先生超性事迹. 钟名旦等编.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辅仁大学神学院, 1996
- [28] 乔纳斯·斯彭斯, 王改华译. 利玛窦传. 236—237 [29] 方豪. 中国天主教人物(中).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04—205

明清之际皈依天主教士人研究新论

作者: 陈占山, [Chen Zhanshan](#)
作者单位: 汕头大学
刊名: [探索与争鸣](#) PKU CSSCI
英文刊名: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年, 卷(期): 2005, "" (1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24条)

1. 罗渔 [利玛窦书信集](#) 1986
2. 陈占山 [四库全书载录传教士撰译著作述论](#) 1998(01)
3. 谢和耐, 耿升 [中国和基督教](#) 1991
4.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1931
5. 耿升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1995
6. 艾儒略, 谢方 [职方外纪](#) 1996
7. 徐昌治 [圣朝破邪集](#)
8. 李祖白 [天学传概](#) 1966
9. 方豪 [中西交通史](#) 2002(03)
10. 汤开建 [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堂教友考略](#)[期刊论文]-[清史研究](#) 2002(03)
11. 杜赫德, 郑德第 [耶稣会中国书信集](#) 2001
12. 黄一农 [被忽视的声音——介绍中国天主教士对“礼仪之争”态度的文献](#) 1995(02)
13. 陈垣 [学术论文集](#)
14.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5. 黄一农 [张宸生平及其与杨光先间的冲突](#) 1993(01)
16. 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 调适与会通](#) 2001
17. [张宸生平及其与杨光先间的冲突](#) 1993(01)
18. [圣朝佐辟](#)
19. 黄一农 [扬教心态与天主教传华史研究——以南明重臣被错认为教徒为例](#) 1994(04)
20. 瞿果行 [瞿式耜“入教”和“借兵”考辨](#) 1990(04)
21. 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 1983
22. 丁志麟 [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 1996
23. 乔纳斯·斯彭斯, 王改华 [利玛窦传](#)
24. 方豪 [中国天主教人物](#) 1988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syzm20051102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6ef980a6-e1db-4bb3-9fa1-9e4d00801422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